

● 中国政治

试评共产国际和 1926 年的“扬汪批蒋”政策^{*}

罗 重 一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罗重一(1953-), 男, 湖南新化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

[摘 要] 1926 年, 中共中央制订并实行了“扬汪批蒋”政策。这个政策是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反革命势力的膨胀感到不安后, 扶持另一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汪精卫上台以抑制蒋介石, 从而给大革命带来了一颗苦果, 并成为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并实行“扬汪批蒋”政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 共产国际; 1926 年; “扬汪批蒋”政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1)02-0180-05

一、“扬汪批蒋”政策产生的背景

“扬汪批蒋”政策产生的背景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孙中山逝世后, 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 国民党内部分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但是, 最具竞争实力的人是被人们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 即在广东根深蒂固的胡汉民、亲承总理遗嘱的汪精卫和深得人心的廖仲恺。而廖仲恺已多次明确表态他无意肩此重任, 所以争权夺利的斗争主要在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展开。当时的蒋介石只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 在国民党内声望甚浅。因而, 他对汪精卫等人是百般奉承, 讨其欢心, 以谋求向上爬升的阶梯。

1925 年 7 月 1 日, 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汉民就任外交部长。不久, 因涉嫌暗杀廖仲恺, 根据共产国际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代表、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的建议, 胡汉民被派往苏联访问; 在广州拥有兵权的许崇智被迫离粤赴沪, 这样就形成汪蒋合作的政治格局。在国民党二大上, 蒋介石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此步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

胡汉民和许崇智离粤后, 蒋介石遂将汪精卫当成是他青云直上的惟一障碍, 总想去之而后快。而汪精卫则深知蒋介石桀骜不驯, 难以驾驭。特别是他上台后, 许多事情都要受到蒋介石的制肘, 对这种“大权旁落”的局面, 汪精卫本能地感到不满, 两人之间自然产生了矛盾。蒋介石却胡说这种矛盾格局是由共产党造成的, 他认为自胡汉民离粤后, “共产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民的惯伎, 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 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1](第 38 页)。这完全是弥天大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矛盾的实质是都想掌握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权, 其主要表现为:

1. 在对待苏俄顾问的问题上, 汪、蒋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汪精卫上台之初, 基本上是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如不少右倾分子大肆攻击汪精卫过分信

赖鲍罗廷,汪精卫对此回答说:“鲍先生总理在时,聘为政治委员会顾问,总理歿后,弟等待之与总理在时无异。顾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鲍罗廷先生在政治委员会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听否之权,操之委员。……不能谓世界上决无一种人肯以纯洁的热忱来助成他人的革命,吾人观鲍顾问年来为吾党努力之经过,吾人惟有服总理知人之明”^[2](第45页)。正是因为持这种态度,汪精卫才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强烈不满,才导致了西山会议派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的议案。而蒋介石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但他十分狡猾,想继续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不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而只是反对苏联顾问个人。他说:“苏俄同志疑忌我,侮弄我”^[3](第618页),故此他建议“改组参谋团,撤换苏俄人员任政务官者”^[3](第619页),并向汪精卫痛陈“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要当不失自主地位”^[3](第628页)。汪精卫则不以为然。故此,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亲俄亲共的态度是十分不满的。

2. 在北伐的问题上,汪、蒋之间有着重大的分歧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季山嘉在一些军事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第一,在北伐的问题上,季山嘉认为不能把北伐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应该在发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胜利的成果。而蒋介石则急于利用掌握的军队去打天下,企图依靠手中的军权去夺取政权。第二,在北伐的去向上,季山嘉认为,北伐打到武汉后,应继续北上去同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汇合,以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蒋介石则主张分兵东南,以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第三,在武器和军费分配的问题上,季山嘉认为应当一视同仁,合理分配。而蒋介石则希望他所领导的第一军能够得到特殊的照顾,季山嘉当然不答应。这就使得蒋介石认为,季山嘉不尊重他。蒋介石对季山嘉的评价是:“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也”^[3](第609页),从而暴露出他同苏联顾问之间在北伐问题上的矛盾。

汪精卫本来是全力支持蒋介石进行北伐的,但出于拉拢苏联顾问关系的目的,此时他又改而赞同苏联顾问的主张。这一举动使得蒋介石大为光火,遂给汪精卫去了一封信,对汪精卫大加指责:“自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此兄不能自主一端也。……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陷入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临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陷入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所立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苏联同志责,兄亦不能辞其责任也”^[2](第45页)。这充分流露出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不满。

3. 在对待军队的问题上,蒋介石对汪精卫心存疑虑

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是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染指的,因此他一直抓住军权不放。汪精卫虽然在名义上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并没有军事实权。所以,汪精卫总是想建立一支拥护自己的军队以改变这种状况。廖仲恺被暗杀以后,汪精卫便以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屡屡到黄埔军校视察工作,从而给蒋介石以很大的威胁感。所以,当汪精卫根据海军政治部主任李之龙的报告,查处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走私活动并将其撤职后,实际上是给了蒋介石一次打击(因陈是蒋的盟兄弟,蒋才保荐陈为要塞司令),蒋介石马上针锋相对,不甘示弱地将汪精卫极力拉拢的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诱至东山扣押并送出广州,从而“向汪精卫作了第一次示威”^[4](第120页)。由于汪精卫和蒋介石分掌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大权,因此怎样对待和处理汪蒋矛盾,就成为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扬汪批蒋”政策的产生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一是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员排挤出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把第一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二是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并逼走了最具有竞争实力的汪精卫

(到法国);三是向苏联顾问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了让步。这样,蒋介石因为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而一举成为国民党的铁腕人物,“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5](第 341 页)。到下半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权,更是独断专行,号令一切,排除异己,扩充嫡系队伍,其反革命势力和野心都在急剧膨胀。但是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毕竟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革命运动都在迅速兴起和发展,各派政治力量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从而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因素。

在各种遏制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北伐战争的前敌总指挥、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异军突起。1926年 10 月北伐军光复武昌以后,湘鄂两省的地盘均被唐生智所掌握。“唐生智把所有不满蒋介石独裁的人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人数不少。他巧妙地挑动陈铭枢(第十师师长)、张发奎(第四军军长)、程潜(第六军军长)反蒋。甚至蒋介石的参谋长白崇禧也不甘心充当蒋的部下,而倾向于唐生智”^[6](第 3 页)。同时,“唐生智也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和花言巧语来证明自己是最正统的国民党左派,他不仅让国民党而且让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去开展工作”^[6](第 3 页)。而且“唐生智善于抓‘时髦’的口号,他强调自己同情汪精卫,积极主张汪精卫非回国不可。他同意说蒋介石不是一个合适的革命的领袖的观点”^[6](第 23 页)。唐生智的这些表演,使得他的政治、军事威望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从而成为和蒋介石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由于唐生智倾向于汪精卫,使得汪(唐)、蒋矛盾又进一步尖锐化起来。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确地认识上述事件的深刻本质,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味地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于 1926 年 5 月就国共合作问题作出了以下决议:(1)对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2)保持国共之间原有的关系;(3)只能在个人职位变动方面向蒋介石作出让步。共产国际发表的文章论及这些决议时说,它的目的在于恢复中派和左派之间的联盟,向中派作出非原则性的让步,从而使中派摆脱右派的影响,即通过“非原则性的让步”来拉住“中派”蒋介石。

共产国际为什么将蒋介石看成是“中派”呢?这主要是受了鲍罗廷的影响。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后,还继续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中派”。他在 1926 年 6 月给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时指出,国民党由 5 个派别组成:原先的国民党人、西山会议派;与买办相联系的右派;以蒋介石军人集团为首的中派;国民党左翼个别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人^[7](第 393 页)。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亲信,又在中国实地指挥多年,他的观点自然在共产国际制定决策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了四届三中扩大全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并指导了会议。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下,中共中央才认为国民党已经分化为 4 种力量:“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等)代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工农群众及激进的知识分子;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小资产阶级;新右派(即中派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资产阶级”^[5](第 170 页)。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议决案》中,继续沿袭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错误,把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原因之一归罪于“我们前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使得国民党左派不参与党务及反对右派的斗争,是“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并强调指出:“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5](第 174 页)。会议认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5](第 170 页),即扬汪精卫“左派”,批蒋介石“中派”。

为了贯彻这个决议案,陈独秀于 1926 年 9 月间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主张。他认为“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便是汪蒋合作,使汪能主持国民党……迎汪绝不就是要倒蒋”^[5](第 311 页)。9 月下旬,陈独秀的意见以《中央局报告》的形式,系统地向全党提出。报告认为:“从革命的全局看,如果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在现时的军人,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反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平衡的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的工作”^[5](第 339 页)。而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避免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手中的危险,蒋介石就“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李唐及其他各方面之反感”^[5](第 338 页)。军权归蒋

介石,党政权归汪精卫,共产党人还有什么权力呢?陈独秀认为:“我们的任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必须立脚于在野党的地位”^[5](第85页)。这就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于1926年9月10日间共同制定的“扬汪批蒋”政策。

随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搞蒋、汪、唐之间的“均势”和“牵制”上,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抑制蒋介石的独裁野心。陈独秀决定:“对于迎汪复职问题,当一面切实进行宣传汪蒋合作,一面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5](第317页)。他认为:“我们对于现时民众拥汪的空气,汪蒋合作口号的宣传仍当不废,才足以胁蒋左倾,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5](第316页)。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迎汪复职宣传运动,报刊等舆论工具上迎汪复职的文章比比皆是。最后,“不仅在工人中,农人中,商人中,学生中如此,甚至黄埔军校内部,百分之九十几变成左派,要求汪精卫回来”^[5](第498页)。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后,蒋介石立即派代表见陈独秀说:“请C°P°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蒋说迎汪复职的目的是:“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5](第325页)。蒋介石当时不便公开地反对迎汪复职,但他却在同迎汪复职直接相关的迁都问题上开始节外生枝,胡搅蛮缠。

虽然蒋介石早就有了军事独裁的野心,但由于时机还不成熟,因而蒋介石多次虚伪地表示,他“要竭尽全力使军队置于党的统率和领导之下,在领导之下行动,避免目标不统一,避免军队听命于个人而不听命于党”^[9](第101页)。这就使得共产国际误认为由于“下层革命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以致蒋介石不得不耍弄手腕,宣誓继续忠于革命原则,忠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宣布服从人民大众的党……国民党的领导”^[10](第303页)。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而这一点对于共产国际在制定“扬汪批蒋”政策时是起了相当影响的。

正当蒋介石加快其反革命步伐的时候,汪精卫也风雨兼程于1927年4月1日回到了上海。而此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和汪精卫勾结,另一方面则到处发表欺人之谈,表示他只专心军旅,所有党政、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以此为他即将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掩护。被这种虚假表态所迷惑,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冲突”^[9](第103页)。4月5日,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策作出的、充满右倾投降主义精神的《汪陈宣言》公开发表。

在与蒋介石达成反共问题的一致后,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就标志着“扬汪批蒋”政策的最终实现。然而,没有让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松一口气,事情的发展就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成立了南京政府,从而宣布了“扬汪批蒋”政策的最终失败。

三、对“扬汪批蒋”政策的几点评价

共产国际为什么会犯“扬汪批蒋”的错误呢?笔者认为:

第一,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方针失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都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而忽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共产国际决定国共合作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还不强大”,“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11](第76页)。所以共产国际始终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并用一切力量去帮助国民党取得党权和军权。而共产党除了抓工农运动之外,没有实权,因而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毫无抵抗之力,只能坐以待毙。

第二,共产国际对汪精卫的本质认识不清。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都是将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故此全力以赴地将其扶上台。并再三指示中共要“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

替他们作领导工作”^[11](第 283 页)。这就导致了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也是“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上^[5](第 575 页),以全力来“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5](第 567 页)。最后,迎汪复职虽然成功,但共产党却一无所得,落到为国民党做嫁裳的地步。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对“扬汪批蒋”政策的出台是负有重要的指导责任的。这种政策的主要内容——把到法国政治避难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请回来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以抗衡军事势力日益强大、独裁野心日渐暴露的“中派”人物蒋介石;它的实质——“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它的实现形式——在扶植了一个买办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蒋介石篡夺了革命领导权以后,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反而又扶植另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汪精卫去篡夺革命领导权;它的后果——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因此,“扬汪批蒋”政策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是我们应该加以坚决抛弃的。

[参 考 文 献]

- [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
- [2] 王光远.汪蒋矛盾与三·一〇事件[J].中共党史研究,1992,(1).
- [3]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卷[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 [4]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6] [前苏联]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时期武汉见闻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 [前苏联]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8] 任建树.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蜕变、消失[J].党史资料丛刊,1984,(3).
- [9]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10]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1919—1927[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Comment o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Policy of “ Praising WANG& Criticizing JIANG” in 1926

LUO Zhong-yi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O Zhong-yi (1953-),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relation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China liberation.

Abstract In 1926, the center of C. P. constituted and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 Praising WANG Criticizing JIANG”. Because the content of this policy was that the center of C. P. felt discomposure when the anti-liberation force of JIANG Jie-shi had grown stronger. So they supported another spokesman of huge bourgeois—WANG Jing-wei to restrain JIANG Jie-shi. But the policy ended with a hard swallow fruit and it wa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of the loss of the Huge Liberatio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layed a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urse of the policy’s constituting and carrying out.

Key word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6; the policy of Praising WANG criticizing JIANG